

□刘宜庆

泉城的桥给了诗人灵感

1935年7月,25岁的卞之琳从日本回国。秋初,应好友李广田之约,来到济南,受聘于山东省立高级中学。济南是泉城,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,有江南的水韵,城中多桥,山东省立高级中学附近有一座杆石桥。也许这座桥给了他创作的灵感,这一年10月,卞之琳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著名诗作《断章》。这首诗在中国新诗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。诗人的哲思在澄澈的流水中升起,浮动于桥上,萦绕于窗口,飞升于明月之上,如梦如幻。这首诗歌最大的魅力在于主客体之间的诗意转换,相映之趣,互为镜像。以古典诗歌常见的具象和意象,抽象出人与物的关系、人与宇宙的关系,构筑空灵、隽永新诗的美与真。一首经典的诗歌,可作多重解读,有人理解为爱情,有人理解为哲学。

卞之琳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,既写自由体诗,又写新格律诗,在新诗格律化方面进行持续不断的探索,著有诗集《三秋草》《鱼目集》《汉园集》与李广田、何其芳合集《慰劳信集》《十年诗草》《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》《山山水水》《人与诗:忆旧说新》等。这位从江苏海门走出的诗人,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。此前,他在上海的浦东中学读书时就开始写诗。进入北大后,师从徐志摩,卞之琳把自己的诗面呈徐志摩,徐志摩读后连连称赞,他对卞之琳说,要选几首登在他们新创刊的《诗刊》上。过了一段时间,徐志摩又找卞之琳要了他新创作的20多首诗,拿给好友沈从文看。他们都对卞之琳的诗大加赞赏,觉得应该把他推上诗坛。沈从文给素不相识且名不见经传的卞之琳写了封信,对其诗表示赞赏的同时,还告知,他和徐志摩都认为可以印一本诗集。沈从文还为这本诗集起名叫《群鸦集》(因诗集中《群鸦》一诗得名),还写了篇《〈群鸦集〉附记》刊登在1931年5月的《创作月刊》上,热情地向读者推荐:“弃绝一切新旧辞藻,摒除一切新旧形式,把诗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张上,自由的而且用口语写诗,写得居然极好,如今却有卞之琳君这本新诗。”

卞之琳读到这篇文章,感到意外的惊喜,开心极了,他觉得自己太幸运了,刚刚写诗,就遇到两位伯乐,热情地提携、无私地帮助他。

徐志摩和沈从文将卞之琳引领进入诗坛。由于徐志摩提携的缘故,卞之琳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“新月”中的一缕清辉;20世纪40年代,卞之琳在昆明,在西南联大,又被视为现代派的代表诗人。在20世纪中国诗坛,卞之琳可谓承前启后。

1931年,徐志摩与上海新月书店谈妥为卞之琳出版诗集《群鸦集》之事。谁知,徐志摩于1931年11月19日遭遇空难逝世,这本诗集被延迟了。

赴岛城拜访沈从文

1933年春天,卞之琳翻译波德莱尔的诗,得了一笔稿费,利用放春假的时间,由北平来到青岛,拜访沈从文,并携带了一本诗稿《三秋草》。此时,沈从文在国立山大执教,寓居福山路3号。沈从文在他半山腰一栋红楼三层的房间里,读卞之琳的诗稿《三秋草》,不由得击节赞叹。沈从文慷慨地拿出30元,支持卞之琳自费出版新作《三秋草》。当时一位中学教师的月薪30元至40元,沈从文的月薪150元,但他要承担他和九妹的生活费用,手头并不宽裕,卞之琳看见他抽屉里还放着几张当票。沈从文坚持把30元塞给卞之琳。实际上,沈从文经济窘迫的状况当时并没有得到改善,这30元是他的未婚妻张兆和提供的。

卞之琳回北平后,就用这些钱将《三秋草》印出300本,这书成为卞之琳得以出版的第一本诗集。1933年5月5日,《三秋草》由新月书店出版,这本薄薄的诗集,收录了18首诗,开启了卞之琳丰厚的诗意人生。

而沈从文资助卞之琳出版诗集《三秋草》,则是将当年郁达夫给予他的友情的温暖,像接力棒一样传递下去。有意思的是,1933年臧克家决定自费出版诗集《烙印》,是接受了卞之琳的建议。当时已到清华大学执教的闻一多为《烙印》作序,卞之琳、李广田、邓广铭在北平为其设计封面,闻一多支持20元,王统照支持20元,还有一位朋友(王笑房)慷慨解囊资助。花了60元出版的诗集,400本很快脱销。当时,臧克家是国立山大的学子,他将卞之琳视为《烙印》的“助产士”,说“没有卞之琳就没有《烙印》”。

卞之琳和臧克家的处女作,都是在山大师友的帮助下,得以出版发行。诗坛冉冉升起两颗新星,苍穹之上,有着青岛蔚蓝大海的底色。

沈从文对卞之琳出版诗集《三秋草》的帮助是全方位的,出资赞助只是一个方面,书名题签是沈从文,作序推荐也是沈从文。“卞之琳君的《三秋草》,就是我所说的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
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
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1935年,卞之琳应好友李广田之约,来到济南任教。在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,城中多桥的泉城济南,他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诗作《断章》。他与沈从文神交已久,在青岛得以相见。沈从文在其寓居青岛的房间里,读罢卞之琳的诗稿,击节赞叹,并资助其自费出版新作《三秋草》。他们之间“闻风相悦”的旧事,堪称一段文坛佳话。

卞之琳与沈从文「闻风相悦」旧事



卞之琳



卞之琳与张充和合影



▲卞之琳诗集《三秋草》
▼1932年春,沈从文在青岛福山路3号。叶公超拍摄



一本简朴的诗。”沈从文很欣赏卞之琳的诗,他以诗歌评论家的身份进行赏析、品评:“我也爱朴素的诗。它不炫目,它不使人惊讶。它常常用最简单的线,为一个飘然而逝的微笑,画出一个轮廓。或又用同样的单纯的线,画出别一样人事。由于作者的手腕,所画出的一切,有时是异常鲜明美丽的。它显得不造作、不矜张。作者用字那么贫俭,有时真到使人吃惊地步。由于文字过简,失去一首诗外形所必需的华腴时,它不能使大多数人从诵读上得到音调铿锵的快乐。用某种体裁来作诗的类型时,它比起来又常不像诗。但它常有一个境界。这境界不依赖外表的华美来达到。”

因为新月派代表人物徐志摩和沈从文的赏识和提携,卞之琳也被视为新月派诗人。

相聚青岛又擦肩而过的感情

就在《三秋草》出版的这一年,卞之琳遇见了一个人,改变了他诗歌创作的路径,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。

1933年初秋的一日,北平西城达子营28号,沈从文家,巴金、靳以、卞之琳在此小聚。碰巧,张充和从苏州赶来,要入北大中文系上学,投靠新婚成家的姐姐张兆和、姐夫沈从文。卞之琳、张充和都来自江南,都在北大上学,同样雅好昆曲,喜欢文艺。卞之琳沉静,张充和活泼,两人挺谈得来,卞之琳感觉“彼此有相通的‘一点’”。卞之琳在晚年回忆起当时的心境:“由于我的矜持,由于对方的洒脱,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,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。”

自此一见后,有一个身影萦绕于心,挥之不去。1935年,张充和因病辍学,回了苏州老家休养。这年秋天,卞之琳开始在济南执教,每当他走过济南的桥,就会想起远在天边的一朵无心出岫的白云。据说《断章》就是其为张充和所作。

1936年暑假前,弟弟张宗和给在苏州家中的张充和写信,“准备去海滨城市青岛走走看看。”张充和当即决定来青岛疗养。海滨的空气清新,张充和患的是肺病,她住在太平路的一栋别墅里,这栋别墅名为静庐,是南浔富商刘锦藻的旧居,青岛喜欢昆曲的人在此举行曲会,张充和就在大曲会上演唱昆曲。

张充和享受着青岛的悠闲时光,她写道:“今晚海向我笑了,月亮在山头上露出一半来,我穿着睡衣伏在窗口向外看。”索性一步步走到海边,“赤脚踏在沙子上很舒服。”“我又跨过几块石头,坐在一个伸在海水中的石头上,我展开双臂向天空,向月亮,向大海,我又不是祈祷,但是我的臂不能缩回来,因为天空、月亮、大海,还有水里的山、山外的小岛,它们太爱我了,我自己想到底我没有去爱它们。完全是它们,它们以一切人间找不到的美来引诱我……”张充和的这篇海滨随笔,如同海边的梦中呓语,“青岛这地方简直美得使我发呆。”

1936年,卞之琳又一次来到青岛。张充和此时也在青岛。然而,他们最终还是擦肩而过,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令人感伤的往事。

“闻风相悦”复于今日实现之

卞之琳租住在青岛莱阳路28号的一个小房间。他邀请“汉园三诗人”另外两位——李广田和何其芳也来青岛度假,当时在莱阳教书的何其芳(沈从文中国公学时的学生)欣然前往,并在青岛度过了1936年的新年。一个多月后,新诗史上的一大标志《汉园集》出版。

1936年10月7日,《华北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文坛掌故《卞之琳和沈从文》,作者署名“五郎”。文章不长,抄录如下:

“卞之琳”一个名字,虽则还不很熟,但是在中国诗坛,他是一颗晶莹的明星。

他有着北方作家的诚恳和温文,虽则他是道地的南方人。

他本来在上海浦东中学理科专业的,毕业后即入北大英文系读书。他在浦中的时候,就动手做诗,到北大后,自然做得更多。

他的诗本来是学徐志摩的,而在北大亲听徐志摩的课时,反而和徐志摩分道了。

他一共出了两本诗集。一本是《三秋草》,一本就是出版不久的《鱼目集》。《三秋草》的出版,是沈从文出的钱,而他和沈从文的关系,就非常奇怪。是前两年,暑期中徐志摩带了他的几首诗,到上海来,在新月书店中,给沈从文看到了,就惊为奇才,要徐志摩介绍,徐志摩说:“在北平。”于是沈从文就写一封信去,从此他们就成了莫逆。

“闻风相悦”在古书上常常看到,不图卞之琳与沈从文,复于今日实现之。

“闻风相悦”出自《庄子·天下》:“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,关尹、老聃闻其风而悦之。”沈从文、卞之琳闻风相悦,堪称文坛佳话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、媒体人)